

那本“褪色的褐皮书”

——从摩尔看伍尔夫的哲学观

李博婷

内容提要：对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哲学思想的研究颇多争论，但常忽视她对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G. E. 摩尔的复杂态度。本文通过细读伍尔夫的小说、日记和书信，提出以下观点：摩尔哲学是伍尔夫哲学认知的起点，其“意识状态”的提法更是影响了伍尔夫以“存在的瞬间”为结晶的创作理念，但摩尔的实证哲学不符合伍尔夫贯穿始终的表象之下有本质、本质才是真正存在的认识。此外，她对自我的关注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她深感兴趣的心理也并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心理学。她强调瞬间的感悟对个体存在以及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并以文学的含糊多义拒绝哲学的明晰确凿，体现了文学家对教条的怀疑以及视文学为终极超越的信念。

关键词：伍尔夫 摩尔 哲学 心理学 意识 存在的瞬间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1-0040-11

DOI:10.16430/j.cnki.fl.2015.01.007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身上的标签很多，她被称为理性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审美家以及社会主义者。与之相应的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也颇为纷繁复杂。一方面，不断有人从摩尔(G. E. Moore)、罗素(Bertrand Russell)、麦克斯塔格(J. M. E. McTaggart)、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荣格、海德格尔、柏格森、梅洛-庞蒂等角度对她进行解读，且意见不一，足证

伍尔夫作品哲学内涵之丰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伍尔夫根本是“反哲学”的，其文学创作理念取心理学的内在性与无意识，而根本摒弃哲学的理性与意识。其中，对摩尔与伍尔夫关系的考察，各路评论家或者忽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或者认为他们根本不同。

对此，笔者认为，不管以后如何不同，摩尔都是伍尔夫哲学认知的起点。对摩尔的回应贯穿她创作的不同阶段，其中既有

肯定也有质疑,态度不无矛盾,从中可见女作家的发展轨迹。至于心理学,伍尔夫深感兴趣的并非其时甚嚣尘上的弗洛伊德心理学,而是对人心理各种“意识状态”的凝视考察。也可以说,她感兴趣的是心理,而非心理学。而且不管哲学还是心理学,如果已成固定的学科,则她对它们的看法都有一种共同倾向,即把它们当作一种“教条”。既是教条,就一样都束缚人,不如摒弃。而文学,以其含混多义和微妙复杂,以及富于同情的感受力,则是她认为可以理解自我、世界和他人的途径。

一

1941年伍尔夫自沉河底,此后三十年文名由其丈夫、作家、出版家、政论家莱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 1880—1969)维持。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回复亡妻的粉丝和研究者关于偶像的种种提问,例如她是否受到柏格森、维特根斯坦、波德莱尔、弗洛伊德、弗莱(Roger Fry)的影响。莱纳德的回答多为否定,说“有一类书她几乎从来不读:哲学和玄学”。(1990:486)但此话并不完全可信。伍尔夫读书很多,包括哲学。查其日记书信,发现她读过的哲学家有卡莱尔、蒙田、伯克利、休谟、柏拉图等。1920到1924年的第二卷日记更是不断说要读柏拉图。但在莱纳德看来,伍尔夫并未受到柏格森、维特根斯坦、波德莱尔的影响;(528)弗洛伊德的影响只是“泛泛”,就像其时“所有聪明人的思维都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哪怕他们从没读过弗洛伊德”;(522)对同属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的老友、画家、艺术评论家弗莱,莱纳德认为伍尔夫确曾受其所谓“后期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美学理论的影响,但影响仍只是泛泛,就像音乐和绘画对她这个艺术

爱好者的影响一样。(528)可是,就在如此多的否定之后,莱纳德热情洋溢、毫无保留地认为伍尔夫受到了一个哲学家——而且只受到这一个哲学家——的影响,此人就是G. E. 摩尔,因为伍尔夫“清晰、明亮、毫无伪善胡说”的“文学风格”正体现了摩尔哲学的净化与升华。(L. Woolf, 1964:25)

摩尔是谁?和柏格森、维特根斯坦、波德莱尔、弗洛伊德和弗莱这些时至今日仍然响亮的名字相比,摩尔之名已然黯淡甚至湮灭了。及至当代,他已鲜有非专业读者。但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某些成员,他是永远的精神导师。就学术而言,摩尔是上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的道德哲学家之一,他推翻了英国当时流行的以麦克塔格为代表的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倡导一种“常识”、理性、实证的分析哲学。人际交往方面,摩尔是剑桥秘密精英社团、哲学讨论团体“使徒社”(The Apostles)的核心,后来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莱纳德·伍尔夫、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传记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小说家福斯特等在求学剑桥时都曾是他的追随者。摩尔最著名的文章是《驳唯心主义》(1903),代表作是《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 1903),最著名的论断是在《伦理学原理》中宣称“我们所知道或可想象的最有价值之事为某些特定意识状态(states of consciousness),可大致描述为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和对美的客体的欣赏”。(摩尔:173)^①就是这句看似简单的表述成了布鲁姆斯伯里的“圣经”,成了他们惊世骇俗、高标独举的生活方式的依据,“意识

^① 此处长河中译本译文有误,因此稍作改动。以下引文都出自长河译本,见参考文献。需指出的是,长河译本把此书作者写为“乔治·摩尔”,其实乔治·摩尔(George Moore, 1852—1933)另有其人,也是英国作家,也与伍尔夫夫妇相识。

状态”一词也成了伍尔夫文学创作的重要理念。^①

但在哲学领域,是否批评界也如莱纳德一般笃信摩尔哲学为伍尔夫哲学思想的实质、或至少也是奠基呢?并非如此。上文说关于伍尔夫的哲学思想,后世观点纷呈,不一而足,甚至互相矛盾。只从近年发表的研究文字来看,仍可见乱象纷呈。西姆(Lorrain Sim)在 2010 年的论著中认为伍尔夫更倾心于柏拉图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而非摩尔、罗素等的理性实证和分析哲学,这就与认为摩尔哲学为伍尔夫哲学之奠基的观点相左,也与班菲尔德(Ann Banfield)观点不同,后者在其 2000 年出版的 500 页巨著中,仔细剖析了罗素和弗莱——而非摩尔——对伍尔夫“现代主义认知学”的影响,等于说不认可摩尔为伍尔夫的思想基础。而 2011 年利文斯顿(Paisley Livingston)通过对伍尔夫一则短篇小说的分析,认为“对美的客体的欣赏”如果脱离“认知和内容”的条件限定,便不能构成审美体验,这似乎暗示伍尔夫对摩尔的核心观点——审美的“内在价值”——的修正。最极端的观点来自莱基(Michael Lackey),他在 2006 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伍尔夫根本是“反哲学”的,原因是作为理性符号体系的哲学发展到 20 世纪,已从知识的最高峰上跌下,让位于代表无意识和非理性的心理学,而伍尔夫本人也明确宣称“现代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可能隐藏在心理学的幽暗所在”。(“Modern Fiction”:152)

为什么对伍尔夫的哲学思想,或者说认知体系和创作理念,会有这样矛盾的认识呢?一个原因当然在于大作家的复杂性。其次,当评论者想用外来于伍尔夫本人的思想来统摄伍尔夫的著作从而试图归纳出一个普遍规律时,也许一开始就偏离了正轨。但是另一方面,以莱纳德所推崇

的摩尔哲学为伍尔夫思想的本质也有很大问题,这点下文即将证明。即使是自诩为最了解妻子的丈夫,也不能替妻子代言,真相还得在作家本人的作品中找寻。可是话说回来,正如开篇所言,在众多哲学流派中选择讨论摩尔仍有意义。因为第一,伍尔夫确曾细读过摩尔。其次,以往论者虽已注意到伍尔夫与摩尔的异同,却并未充分了解伍尔夫对摩尔的复杂态度,也未能深入挖掘伍尔夫卷帙浩繁的日记书信,未曾理清女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变化,因此还需对此加以仔细考察。

二

如前所述,摩尔哲学是伍尔夫哲学认知的起点,时代氛围如此。伍尔夫所处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很多成员毕生信奉摩尔哲学。斯特拉奇以《伦理学原理》出版的 1903 年 10 月为“理性时代的肇始”。(Holroyd:89—90)1960 年八十岁的莱纳德回忆起《伦理学原理》时,仍如年青时一样热情,说此书“第一次向我们揭示了真理与现实、善与恶、性格与行为的本质,并因此替代了耶和华、耶稣、圣保罗、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等诸多宗教和哲学令我们纠缠其中的梦魇、错觉与幻象。他的哲学是简明

^① 这是否真是摩尔此书的真正内核,评论界有不同意见,因不是本文范围,此处只作简单说明。罗素就曾指布鲁姆斯伯里人误解了摩尔伦理学的本质,指责这些自称是摩尔追随者的人把他的伦理学“降级成了一间沉闷女校的感伤”。(71)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韦伯(Beatrice Webb)也说风靡于年轻人中的摩尔伦理学不要科学,不要宗教,分裂年轻人的智识和性格,给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借口。(Levy:4-5)的确,斯特拉奇、凯恩斯、福斯特都是同性恋,布鲁姆斯伯里更是异性恋、双性恋、同性恋和三人行的混和。而彼时在英国社会占主导的仍是维多利亚的异性恋价值观,社会对“异常”性行为多不容忍。王尔德因同性恋被判刑是 1895 年的事,距《伦理学原理》出版不过八年。奇怪的是,摩尔青年成名,与布鲁姆斯伯里共存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却从未就其思想对布鲁姆斯伯里的影响做过辩解。

的常识,好比空气之新鲜、光明之纯净。”(1960:147)这等于否定犹太教、基督教以及西方整个唯心主义传统。凯恩斯在《我的早年信仰》中对摩尔同样忠诚,说摩尔哲学“令人激动振奋,是新生的开始、新天新地的开辟。自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种新制度的先锋,我们无所畏惧。”他认为摩尔伦理学的好处在于它摆脱了维多利亚的功利主义,也比后来的“弗洛伊德纯洁甜蜜”。1938年这位年已五十五岁、名满世界的经济学家还说:“如今回首,在我看来,它是伴随年轻人成长的一种好宗教,它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宗教都更接近真理,更少不相干的多余之事,丝毫不令人感到羞耻。”(248)

如此说来,摩尔哲学是1900年代未嫁的弗吉尼亚·斯蒂芬(Virginia Stephen)初试写作时所能接触到的最前沿的思想。她熟悉摩尔哲学,莱纳德说摩尔可能是她唯一读过的现代哲学家,她也承认摩尔对布鲁姆斯伯里的巨大启示。她在《老布鲁姆斯伯里》(“The Old Bloomsbury”)一文中说:“摩尔的书使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讨论哲学、艺术、宗教。”(V. Woolf, 1985:168)她的处女作《出海之旅》(*The Voyage Out*, 1915)就表现出她非常倚重身边这个小圈子的思想能量。首先,出海的那条船名叫“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意为欢乐,是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之一,也是包括莱纳德在内的布鲁姆斯伯里人1905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的名字。其次,书中某个女性人物正在读的“一本黑皮书”内容有关“物质的现实,或善的本质”,这本书无疑就是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更有句话说“善是不可定义的”,(116)而这正是《伦理学原理》第一章“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原话和核心思想。

思想者们业已扬帆出海,而广大英国

社会却仍处于维多利亚朝的阴影笼罩之下,其特点伍尔夫一言以蔽之为“物质主义”(materialism)。她的文学革新正是发轫于这两种思想的对抗之间,她要做的就是以刻画人的精神和灵魂来对抗只写物质生活的维多利亚作家的普遍倾向。在其文学宣言《现代小说》和《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中,伍尔夫抨击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朝的三位代表作家高尔斯华绥、威尔斯和班奈特(Arnold Bennett)是“只重身体不重精神”的“物质主义者”。(“Modern Fiction”:147)伍尔夫认为“生活不是一系列对称排列的马车车灯;生活是光晕,是半透明的笼罩,从我们开始有意识(consciousness)到结束,一直围绕着我们”,因此小说要揭示“这个不断变化、不为人知、不受制约的精神,不管它表现出怎样的偏差与复杂,而且越少异质与外来的混杂越好”。(150)

这话颇可与摩尔的“我们所知道或想象的最有价值之事为某些特定意识状态,可大致描述为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和对美的客体的欣赏”的理念类比,因为它们均表明,对伍尔夫和摩尔来说,存在的本质归结于“意识”。这个“意识”,伍尔夫还用另一个词“精神”(spirit)表示。但此话也明显暴露了二人的区别。在表述方式上,摩尔非常清晰,他确实以此著称,据说他令学生胆寒的一个经典提问就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在他看来,不精确则无价值。而伍尔夫的风格却具有典型的含混(“光晕”和“半透明”)和拒绝精确。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重要区别,即哲学和文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区别,类似杨周翰所言“理性化了的人生观与诗歌”的区别。(140)

这种区别乍看无甚新鲜,长久却会造成惊人后果。换句话说,哲学很可能非但不能启发文学,反而束缚文学。比如摩尔

最热诚的追随者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一度被布鲁姆斯伯里同仁赋予亨利·詹姆斯般伟大小说家的期许,却终其一生连一本小说都写不出来,只好退求其次编杂志和为报刊撰稿。究其原因之一,莱纳德认为,就是摩尔的这声发问所包含的那种“紧张的智识束缚”与这个学生“抒情的”才华背道而驰。(1964:138)而从没受过正规教育、全靠自学的伍尔夫却有勇气摆脱偶像,成为小说大家。也许,不上“牛桥”^①的她从一开始就能与男性学术权威保持审视的距离,使她从来不惧于质疑摩尔。

例如,“万事万物是它自己,不是其他”,这是摩尔用作《伦理学原理》卷首题词的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的话。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中却说:“那么那个是灯塔吗?不,另一个也是灯塔。因为没有哪个事物只是一事一物而已。另一个也是灯塔……”(2012:141)这似乎就是对摩尔有意的反动。此外,书中女画家莉莉·布里斯科知道所画对象“是椅子,是桌子,但同时又感觉那还是奇迹,那还是狂喜”。(153)桌椅如何能成为饱含宗教虔诚的奇迹与狂喜?此处隐含布鲁姆斯伯里的一个艺术理念。这个一半是文学、一半是绘画的团体起源于所谓“后期印象派绘画”,奉擅画静物的法国画家塞尚为圭臬,其成员弗莱说塞尚的静物是“画家最纯洁的自我显现”。(4)如果最普通的日常事物背后都隐藏自我,还怎能以为伍尔夫认为万事万物只是其自身,而不是其他?及至晚年,伍尔夫更把世间万象比喻为“棉絮”,认为它虽看似含混,却“启示着某种秩序,预示着表象背后的某种真实存在”。(V. Woolf, 1985:72)承认并试图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并认为这个本质才是更真实的存

在的想法,贯穿了伍尔夫创作的始终,成为她与实证主义哲学家摩尔的另一大区别。

可是,话说回来,“万事万物是它自己”也有其道理,伍尔夫并非不能体会,也肯定过摩尔这一思想。小说《黛洛维夫人》中,黛洛维夫人出神凝望隔壁房屋,看一个老妇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她的事,一边思考存在的奥秘。这个不断出现的老妇人不妨理解为黛洛维夫人的老年,也就是说,她在人生的此岸遥望自己的将来,甚至是死亡的彼岸。她觉得宗教和爱情都无法解开这存在的奥秘,但那奥秘其实又很简单,“无非是这是一间屋,那是另一间屋”。(1928:193)这话令人想起摩尔在公开演讲中说过的那句名言。为证明外部物体的存在,摩尔向听众举起双手,说:“这是一只手,这是另外一只手。”简单至此,事物自身就是其存在的最好证明。换句话说,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不是爱情也不是宗教。

另一处体现伍尔夫对摩尔的若即若离是她对“意识”的认识。他们二人都不曾定义“意识”,造成其概念源头的晦暗不清,但他们都曾把“意识”与心理学相关联。

先看摩尔。《伦理学原理》除三四次简单提及外,几乎不谈“意识”,虽则其中一处就是被布鲁姆斯伯里挑出来朝拜的“意识状态”。要看“意识”,需看摩尔 1903 年发表的《驳唯心主义》,其中一段关于“意识”的名言一年后被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意识存在吗?》(“Does ‘Consciousness’ Exist?”)一文中引用:“我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之上,想要看它到底是什么,它似乎就消失了;我们面前仿佛只有一片虚空。当我们想要内省对于蓝的感觉,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就只是

^① Oxbridge,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戏称。

蓝。”(Moore, 1965: 25)于是摩尔总结说,意识是“透明的”(diaphanous),等于不承认意识的独立存在,认为意识只能依附于物质与行为之上。1909年摩尔又发表《心理学的主题》一文,说“对我而言,心理学似乎有其特殊的主题……即宇宙万物中那些本质是‘精神’(mental)或‘心理’(psychical)的东西”,他要考察“精神”和“心理”与非“精神”和非“心理”的界限。(1909—1910: 36)这说明他借心理之名探究的其实还是哲学最古老的命题:主客观的分界。他还说“意识”就是心理学的对象之一,但“意识”除了用“意识行为”命名外别无他法,等于又一次承认他在《驳唯心主义》中提出的意识的“透明性”,即“意识”非借“物质”或“行为”而不能够存在。但是由此反观他人生“最有价值之事为某些特定意识状态”,即友谊和审美的论断,则可知摩尔虽然注重实证,得出的结论却是伍尔夫最能欣赏的毫不功利的人生观。这应该是“意识状态”这个术语对伍尔夫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吧。

再看伍尔夫,她对“意识”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上所述,1919年《现代小说》宣称“现代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可能隐藏在心理学的幽暗所在”。但“心理学”并非指弗洛伊德心理学,实际上,有论者指出伍尔夫直到1939年才真正开始阅读弗洛伊德,还指出她的小说、日记和书信中每每提到心理分析和精神治疗师,总是充满嘲讽与贬低。(Hussey: 94)这事对伍尔夫而言,不啻为一桩矛盾。因为莱纳德早在1914年就为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写过书评,还阅读了《梦的解析》,并因此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英国最早发现弗洛伊德价值的人。并且,伍尔夫夫妇的贺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自从1924年起便成为弗洛伊德在英国的唯一出版人,他们夫妇正是心理分析在英语世界最有力的

推手。1939年弗洛伊德避祸伦敦,曾与他们夫妇相谈甚欢。另外,伍尔夫自己的弟弟、弟妹是心理医生,她的朋友、弗洛伊德的英译者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夫妇也是心理医生。可是伍尔夫宁可被疯病折磨,几次走到发疯的边缘,并且最后自杀,却都不肯找弗洛伊德和亲朋进行心理治疗,亲身体会最先进的精神治疗法,原因就在于她相信心理世界的幽暗神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混沌整体,不愿把一切思想情绪都理性化、清晰化。

“心理学的幽暗所在”实际指俄国作家,如契诃夫,因此还是一种文学表达,而非理论的、系统的心理学的科学尝试。19世纪俄国文学于世纪之交在英国被大量译介,曾对青年一代作家造成巨大影响。建构了伍尔夫小说美学的文章《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重申俄国作家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写人的灵魂(soul)。由此可以总结:所谓“意识”,在摩尔等于mind,对应头脑、思考和理性;而在伍尔夫则爱用spirit,对应感受、灵魂,对立于物质(material),但此物质非哲学意义上的物质(matter),而是极具贬义的金钱、市侩、庸俗的同义词。此外,在伍尔夫的词汇表里,灵魂、精神、心理、意识不必细分,意思相同。她不会像摩尔一样条分缕析各种概念的界限,她也根本没有这种界限感。“意识”的这种富于文学气质的含混用法如果不是伍尔夫的戛戛独造,也至少是她的显著特点,因为她的同代人、诗歌革命者、文艺批评家艾略特(T. S. Eliot)的文艺理念的关键词就不是“意识”而是“传统”。

伍尔夫对“意识”的实验肇始于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 1917)和《秋园》(“Kew Gardens”, 1919),至长篇小说《黛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日臻成熟,至《海浪》达到巅峰。这种

写作技法后世称为“意识流”，现已成文学常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伍尔夫本人从未使用“意识流”一词，她用的词是“意识”和“意识状态”。比如，1924年4月27日，在写作《黛洛维夫人》时，伍尔夫在日记里说：“我现在的思考是人有无数种意识状态(states of consciousness)，我想探索‘聚会意识’和‘裙子意识’。”(1980: 12)由此产生了围绕黛洛维家晚会的九篇短篇小说，篇篇写人与人相遇时的不同反应：有人互相憎恶，有人一见如故，有人想交流却无法交流。其中最著名的《那条新裙》(“The New Dress”)写一个女人因穿着一条新裙而引发的从喜悦骄傲到痛苦自卑的情感变化。表面看什么都没发生，人物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这种写法等于延续了奥斯丁在“两寸象牙”上刻划女性心理的细微风格，只不过更加走入了心灵深处的分叉小径。

时间过了十年。到了小说《年年岁岁》里，还是一个女性人物在读哲学，这是一本“褪色的褐皮书”，书里说“世界只是思维再无其他”——典型的唯心主义想法。这说明对伍尔夫而言，哲学已然光彩不再，她的人物不再阅读摩尔。这个人物决定摒除外部世界的干扰，专心“思考”自我。于是她躺上床，从脚开始思考，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屏蔽外部世界：“无法进行思考。她变成了某样东西；根；扎在土里……枝干上长着叶子。”(2002: 132—33)这个近乎滑稽的例子证明：自我是如此顽强的存在，它不见容于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弗洛伊德都在信奉的身体与意识之间的二元对立，它在其中找不到位置。也就是说，时至今日，伍尔夫最感兴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二元对立中的物质和意识，而是自我。

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到了1939年，即伍尔夫自杀前两年，她写了《往日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这是她最详尽的自传性文字和最成熟的创作总结，其思想结晶就是“一点她自己的心理学”——“存在的瞬间”。(1985: 70)什么叫“存在的瞬间”？伍尔夫的定义是人每天的非存在多于存在，人大多数时候只是浑浑噩噩，没有真正在“活”，但如果经历片刻的震惊，即“存在的瞬间”，自我就可在庸常中醒悟过来，认识到现实与存在的意义。文人艺术家对这种深刻的精神觉悟的追求古已有之。奥古斯丁在米兰花园里的“顿悟”；但丁在《神曲》开头感叹“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1)歌德的浮士德呼号“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停一停吧，你真美丽……”；(706)乔伊斯的青年英雄斯蒂芬(Stephen Dedalus)面对汤汤流淌的利斐河的“显现”(epiphany)都是这样一些瞬间。这是一种带有高度宗教意味的体验，是无神论者的伍尔夫追求的艺术的终极价值。

正如《伦理学原理》中“善是不能下定义的”一语指出了功利主义哲学家所犯的“自然主义谬误”，因此对摩尔极为重要，“存在的瞬间”对伍尔夫的意义在于照亮了自我与他人、人与物、表象与本质之间的联系以及作家通过写作赋予世界意义这一终极“哲学”。上文提到，在《往日素描》中，伍尔夫把世间万象比作“棉絮”，它虽看似含混，却启示着某种秩序；表象背后有某种真实存在；作家通过诉诸词语使其真实；而且只有通过诉诸词语才能使它得以完整：

我从中得出我所谓的哲学；不管怎样，这是我常有的一个想法，即在棉絮背后隐含着 一个模式；我们——我是说全人类——都与之相关联；整个世界就是一件艺术品；我们都是这艺术品的一部分。《哈姆雷特》和贝多芬四重奏都是我们叫做世界的这个巨大体积的真相。但是没有莎士

比亚,没有贝多芬;当然也一定没有上帝;我们就是词语;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事情本身。(1985:72)

伍尔夫终于有了她自己的“哲学”,或者按照她自己的命名,她宁可叫它“心理学”。“我们就是词语;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事情本身”的措辞带有伍尔夫式的流利与诗意,也回荡着《圣经》的庄严风格,令人想起《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对门徒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表明:伍尔夫认为世界在万千乱象下仍有规律可循,艺术就是这世界的终极规律,人就是这世界最重要的意义;对作家而言,唯有凭写作才可找寻到这规律;文字就是使世界变得真实的途径,作家藉写作体会所有人的人生,把一切人连接起来,使他们不致成为孤岛。正如《到灯塔去》中说“没有哪个事物只是一事一物而已”,《海浪》也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很多人”。(1931:205)一个人的自我因此存在于广大的世界和人群之中,人间最宝贵的是同情和理解,人和人需要沟通了解。

三

以上所说是伍尔夫的作品中反映的她与摩尔的几点异同。本节将考察她常被忽略的六卷书信和五卷日记,因为这里有伍尔夫更明确直白的对摩尔的感受与评价。书信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及摩尔是在1908年的8月,此时伍尔夫还是未嫁的斯蒂芬小姐,正在萨默塞特郡一所神学院度假。她虽已开始写作《出海之旅》,却基本上还只是个为《泰晤士报》写书评的学徒。她在神学院度假,读的却是《伦理学原理》,多么有趣的巧合。她大约每夜读十页,一个月内读完,在此期间五次给家人朋友写信报告心得,不妨都征引如下。

3号的信里说:“我开始像一只努力的小虫一样攀爬摩尔,因为这只小虫决心在教堂的塔尖顶上筑巢。一句话、一连串‘欲望’,连同这不加修饰的词语的无尽的意义使我头晕;但除此之外,我还算读得高兴。”(1975:340)10号,她说她激动地期待每夜人静后读十页摩尔,但又说“这世上有些事是我不知道也不会明白的。昨夜入睡时我想象吃冰激凌将是何感受,今早醒来,我想摩尔是正确的。他管这叫波尔多葡萄酒,但是我猜这大概没有区别?”(347)14号,她说自己几日来“读摩尔有了些进展,虽然不得不在同一页里爬来爬去好多回,直到我几乎看到了自己的爬痕。我想向你求教,但我怀疑我甚至连一个明白的问题都想不出。”(352—53)19号说:

我每夜苦读摩尔,我感到一些念头旅行至我头脑的最边远处,在那里引起一丝微弱的骚动,但是几乎无法称为“思想”。这简直是一种身体的感受,仿佛迄今为止从未被血液造访过、像蜡一样苍白的一小圈大脑终于有了一点生命,只是无力维持这点生命。我非常清楚我哪部分头脑可以思考。(357)

29号是最后一次信,说“昨晚我读完了摩尔。他在结尾处好好表现了一下他的骄傲——这也不足为奇。我现在不像先时那样愚笨了,我明白得越多就越佩服他。他尽管意欲了解真理,却又同时如此人道。我想在一件事上,我可以不赞成他。”(364)这件事是什么,伍尔夫没说,给文学史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缺口。笔者愿意推测这个似乎没人注意、也难以填补的缺口很可能正是上文所讲“万事万物到底是它自己还是也是其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不赞成正代表伍尔夫对摩尔决定性的疏离。

从以上五段书信,可梳理出伍尔夫的

如下思想脉络:作为哲学初学者的诚惶诚恐(小虫爬高塔);对阅读对象富有文化意义的树立,以哲学代宗教的初衷(教堂,而且是主教教堂,非一般小教堂);渴望对阅读对象的征服与超越(小虫爬上高塔筑巢);事物间有何联系(冰激凌还是葡萄酒);语言的多义性及其无限延展性(这点与莱纳德、凯恩斯明显不同,他们从未抱怨摩尔难读,反而赞其清楚明白。当然,伍尔夫遭遇的语言困难并非文字层面的,她早说摩尔用词朴素、“未经修饰”,困难大概在于哲学家与小说家运用语言的方式不同,哲学家需要严格定义、条分缕析,小说家则追求灵动含混);摩尔哲学的巨大启发作用(沉睡的头脑被唤醒);真理可以用一种更人道的方式表达;最后,钦佩却不完全赞同。

更加私密的日记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伍尔夫对摩尔的质疑甚至颠覆。跨越二十六年的五卷日记虽然只有九次提到摩尔,但都足够敏感,常伴以审视的眼光。其中,1920年,四十七岁风采不再依旧的摩尔造访伍尔夫夫妇的乡村居所“僧舍”(Monks House)。伍尔夫向他问起英国18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伯克利(George Berkeley),他解释给她听,她没听懂,于是说“我一点看不出为什么他曾是青年人的控制者和独裁者。可能剑桥太‘洞穴’了。”(1978:49)洞穴说当然来自柏拉图,也有可能伍尔夫知道莱纳德当年在使徒社的一篇讨论稿里把摩尔比喻为哲人王。至于剑桥,我们不难想起《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其女权意识对“牛桥”作为男性知识权威把女性拒斥在文化和教育之外的猛烈抨击。“剑桥太‘洞穴’”当然不是赞扬摩尔哲学,而是批判男性知识体系之封闭僵化。

又过了二十年,1940年,他们都老了,伍尔夫更是还有一年就将走到人生的终点,摩尔再次造访“僧舍”。面对已经削减

了“力量与质量”的摩尔,伍尔夫想起当年她曾那么敬畏他,想起他著名的“沉默”,他的“影响力”,于是“我颇为强烈地认为,他把他的影响力发挥得太过了,我们的指控是他沉默了他那一代人”。(*The Diary*, Vol. 5:286)这可真算是偶像的崩塌。或者是否可以认为,一个已经完全成熟了的女作家终于完成了她创作之初矢志的对男性哲学的超越?

对伍尔夫而言,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哲学如何思考,文学是终极的超越。伍尔夫本就反对以小说为哲学的演练场,她说“如果哲学没有被小说吃透,那么当我们用铅笔给一段话划线,并用剪子把这段劝诫之言剪下来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说哲学出问题了,或者小说出问题了,或者哲学和小说都出问题了”。(1948:253)含混多义从来都是伟大文学的标志,伍尔夫因此拒绝“锁定”和“确定”文学的含义,例如《到灯塔去》的灯塔象征什么,伍尔夫在给弗莱的信中说:

我写灯塔什么都不代表,一本书的中间总得有条中心线把布局笼住吧。我知道各种各样的感觉都会因此产生,但我拒绝将它们理清,我相信人们会把这[中心]作为他们情感的安置所,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有人认为灯塔是这,有人认为灯塔是那。除了用这种模糊和普遍的方式,我无法驾驭象征主义。这是对是错我不知道,但假如有人直白地告诉我一件事是什么意思,它马上就变得可憎了。(1977:385)

为什么确定是一宗罪,大概是因为但凡信仰很容易僵化为教条,那时就会变得非常可怕。以到《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为例,这个哲学家兼专制男性家长是个非常不可爱的人物,就像伍尔夫小说中的信教者(《黛洛维夫人》中的德裔家庭女教师的名字 Kilman 让人想到“杀人”)和无神

论者(《到灯塔去》的唐斯利)一样不可爱。可见伍尔夫对哲学和宗教抱相同态度,即信或不信不要紧,信或不信的对象也不重要,要紧和重要的是不能把一己之信或不信当成唯一真理强加于人。与拉姆齐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姆齐夫人,他们夫妇代表两种不同的认知体系和生活方式:作为哲学家的拉姆齐先生的人生只有“知识”,他把世界条分缕析为从 A 到 Z 的线性结构,并以此为标准攀爬智识阶梯,却倍感个人的局限,因为他顶多只能爬到 Q。而作为家庭妇女的拉姆齐夫人则以开放宽容之心和温暖体贴的情感待人接物,因此成为专制丈夫的贤妻、八个孩子的良母、得她款待帮助的朋友们的益友、受她接济救助的贫民们尊重的好太太,和伍尔夫认为身为女人需要“从母亲追溯过去”(1998:99)的母亲典范。

因此与其信奉哲学或宗教,伍尔夫以小说家的“同情心”提倡一种更有想象力和感受力的人生视野和多元价值。就像《黛洛维夫人》结尾处,忍受不了精神折磨的一战伤兵史密斯终于在这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跳楼自杀了,他的医生因此在黛洛维夫人的上流社会晚宴迟到了,而得知此事的黛洛维夫人在觥筹交错、笑语人声间不由得心怀同情体恤怀念史密斯。这两个素不相识、千差万别的人最终达到了一种心灵相通。这是伍尔夫小说最感人的“存在的瞬间”,是困扰伍尔夫的“自我”问题终于得以解决的一个瞬间。从1908年那个每夜苦读一本黑皮哲学书的新人,到1937年褐皮书褪色,最后到1939年达至生命终点时提出“存在的瞬间”——这个漫长的过程见证:当宗教不再是普世真理,当哲学不再能满足思考,当心理分析成为对人精神尊严的侵犯,对一个苦苦寻求人生意义的作家来说,文学成为终极的超越。□

参考文献:

1. Banfield, Ann. *The Phantom Table: Woolf, Fry, Russell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Modernism*. Cambridge: CUP, 2000.
2. Fry, Roger. *Cé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27.
3. Holroyd, Michael. *Lytton Strachey*. London: Vintage, 1995.
4. Hussey, Mark. *Virginia Woolf A to Z: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to Her Life and Writings*. Oxford: OUP, 1996.
5. Keynes, John Maynard. "My Early Beliefs." *Essays and Sketches in Biography*. New York: Meridian, 1956.
6. Lackey, Michael. "Modernist Anti-Philosophicalism and Virginia Woolf'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9: 4 (2006): 76-98.
7. Levy, Paul. *Moore: G. E. Moore and the Cambridge Apostles*. London: Weidenfeld, 1979.
8. Livingston, Paisley. "'Solid Objects,' Solid Objections: On Virginia Woolf and Philosophy." *Art and Ethical Criticism*. Ed. Gary L. Hagberg.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1.
9. Moore, G. E. "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Totowa: Littlefield, 1965.
10. —. "The Subject-Matter of Psych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0 (1909-1910): 36-62.
11. Russell, Bertrand.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 London: Allen, 1967.
12. Sim, Lorrain. *Virginia Woolf: The Patterns of Ordinary Experience*. Farnham: Ashgate, 2010.
13. Woolf, Leonard. *Beginning Again: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911-1918*. London: Hogarth, 1964.
14. —. *Letters of Leonard Woolf*. Ed. Frederic Spotts. London: Weidenfeld, 1990.
15. —. *Sowing: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880-1904*. London: Hogarth, 1960.
16. Woolf, Virginia. "A Sketch of the Past." *Moments of Being*. Ed. Jeanne Schulkin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17. —. "Modern Fiction." *The Common Reader*. New York: Harcourt, 1984.
18. —. *A Letter to a Young Poet*. London: Hogarth,

- 1932.
19. —. *A Room of One's Own and Three Guineas*. Oxford: OUP, 1998.
20. —. *Mrs. Dalloway*. New York: Harcourt, 1928.
21. —.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2. Ed. Ann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22. —.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5. Ed. Ann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23. —.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Eds.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24. —.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3. Eds.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25. —. *The Voyage Out*. Auckland: Floating, 2010.
26. —. *The Waves*. Orlando: Harcourt, 1931.
27. —. *The Ye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002.
28. —. *To the Lighthouse*. London: Urban Roman ~ tics, 2012.
29. 但丁:《神曲》,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0. 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北京 102600

《外国文学》2014 年度编委会简报

本刊 2014 年度编委会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来自京沪两地的编委委员共十四人与会。考虑到转徙不便等因素,此次未通知境外委员参会,嗣后将以书面形式报告咨询。

编委会由杂志主编金莉教授主持并致辞,她向与会委员表示诚挚的欢迎与感谢,并宣布会议议程。杂志副主编姜红教授代表编辑部向委员会汇报三年以来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五个方面:编辑部人员组成、编辑方针、出刊情况、杂志学术年会和今后的办刊计划等。她强调本刊编委会自成立以来对编辑部各项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为此她代表编辑部向所有为杂志发展做出贡献的编委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接下来发言的编委委员有北京大学教授刘意青、申丹,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谭晶华、卫茂平,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刘文飞、王逢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周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中载、张建华、韩瑞祥、王炳钧、马海良等。他们热情肯定了编辑部的各项工作,对杂志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建议,综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继续与国家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宏扬人文主义思想,通过杂志的努力争取使全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提高到一个新的学术水平。二、适应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形势,调整杂志栏目,平衡地区文学研究比重,扩大外国文学的普及范围。三、继续保持并加强文化专题研究的良好传统,重启专栏译介,办出自己的特色。四、进一步重视学术规范的建设,以此引导健康的学术风气。

最后金莉教授做总结发言,表示杂志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欢迎编委委员对编辑部工作随时给予指导。她代表杂志全体同仁向各位委员、尤其是不辞辛苦远道莅临的谭晶华教授和卫茂平教授再次申谢。

FOREIGN LITERATURE

BI-MONTHLY, NO. 1, 2015

Editor: JIN Li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Selected Abstracts

LONG Yun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Fabrication: The Postmodern Narrative Devices in “The Leather Man”** 3

American postmodern novelist E. L. Doctorow is proficient in combining different devices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to attack consistently on social problems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tmodern narrative devices in “The Leather Man” in three aspects: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and imaginary events,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and imaginary figures, and the allusions of combining name of different periods. “The Leather Man” attempts to expose the performing behaviors, the deceptive discourses and the overwhelming authorities by means of discussing the race discriminati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class discrimination in the society and of “demystifying”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The Apollo Moon-landing”.

JIANG Yuhui **An Interpretation of Lakoff’s Theory of Metaphor from the Viewpoint of Bonnefoy’s Metaphor of “Listening”** 15

Though quite influential among scholars, Lakoff’s metaphor theory still has its insurmountable weakness, especially when it is applied in studies of poetry. His inspiring analysis of poetic metaphors sometimes delves into greater details, but the presupposed priority of ‘basic’ metaphors has also led to a deep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reation of new metaphors.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Bonnefoy’s poem *Douve*, we try to clarify the main features of basic metaphors in poetry and how the metaphors of ‘li~stening’ could dramatically play such an essential part in his works. From all these argum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metaphor (poetry) to conception (philosophy) will also get revealed.

SHEN Dan **One-way Projection behind Two-way Secret Love: Covert Progression in Mansfield’s “Psychology”** 27

Ever since Aristotle, critical attention has focused on the plot development. But in Mansfield’s “Psychology”, like in many other literary narratives, there exists a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the plot development. In the latter, the male and female protagonists secretly love each other but try hard to suppress their feelings in order to maintain a Platonic friendship, and the focalization shifts between them. By contrast, in the covert progression, the female protagonist, who consistently functions as the focalizer, cherishes passionate unrequited love for the male protagonist and constantly projects her feelings onto him until the resolution. The plot development serves as a multi-dimensional foil for the covert progression which reveals in a very subtle and dramatic way the complicated psychological activity of the female protagonist. The two parallel narrative movements, which both complement and subvert each other, present dual images of the characters, convey rich thematic significance, and generate remarkable aesthetic values.

LI Boting **Virginia Woolf’s Philosophy through G. E. Moore** 40

Critical study of Virginia Woolf’s philosophy tends to ignore the complex response she makes to the

English philosopher G. E. Moore.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her novels, diary and letters, the present article proposes that Moor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Woolf's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and that Moore's "state of consciousness" impacts Woolf's crystallization of "moments of being" as her ultimate literary epistemology. However, Moore's "diaphanousness" of consciousness i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Woolf's advocacy that behind the appearances is the essence of being. Besides, her preference for ambiguity to his hair-splitting analytical argumentation and clarity of expression characterizes their different styles. In addition, her obsession with the "self" not just displaces the binary tradition, but the psychology she is interested in not Freudian. This demonstrates her suspicion of all dogmas and her belief in literature as the transcendence of all dogmas, either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al.

YU Lei Four Aspects of Edgar Allan Poe's Fictional Aesthetics 51

Though Edgar Allan Po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upon his poetical aesthetics, his theoretical concerns as regards fictional aesthetics remained more or less fragmented. To a large extent, this has brought about, either at home or abroad, the abnormal tacit agreement to "the aesthetical precedence of Poe's poetry over his fiction". Given the status quo,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cavate and synthesize the pieces and bits of Poe's fictional aesthetical ideas that are scattered amid various journals and papers, and in so doing, point out four important aspects—"Truth", "Moral", "Reader" and "Plot", which are aimed respectively at a dialectical equilibrium of poesis between "verisimilitude" and "grotesquerie", "upper-current" and "under-current", "encoding" and "decoding", "departure" and "return".

MU Yang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Snow White" Motif in Contemporary Parodies 62

Since the late 196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new historic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classical fairy tale has been an important target of rewrit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rewriting, which repeats, strengthens and reinforces motifs of fairy tales, the contemporary doubts, subverts or dissolves them.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contemporary parodies of the "Snow White" motif — *Snow White* by Donald Barthelme, "Snow White and Seven Dwarfs" by Anne Sexton and "Snow Child" by Angela Carter, and analyzes their common efforts to dissolve the motif. It argues that these revisions, in image choosing, character molding and plot designing, expose "the eye of power", reveal the mechanism that fashions female subjects from the aspects of "disciplining" and "punishing" respectively, explore the patriarchal root of "jealousy" — the archetyp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question the essentialist belief that women are born hostile to each other, unveil the narrative quality of "truth" as well as the hidden power relationship behind "truth", and thus achieve the goal of challenging the power discourse.

LIU Dan The "Fictional Reality" and Non-Orientalist Narration: Michael Ondaatje's *Running in the Family* 71

Owing to the fictitious narrative techniques, such as imagination and exaggeration, used in family history narration, Sri Lankan-Canadian writer Michael Ondaatje's novel *Running in the Family* is criticized as a writing of Orientalism. The complexity of his writing background and the variety of narrating strategies considered, this essay aims to make the case that the novel is non-orientalist on account of its "fictional reality", through comparing the motivations of fabricating, authoritative awareness, and standpoints between the Orientalist and Michael Ondaatje.

LIU Yuning Interrogating the West through the East: Sollers and Chinese Culture 79

Philippe Sollers has been, since the 1960s, a central figure of the French literary scene, and he keeps exploring and pondering upon French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has such a deep influence on Sollers's